

## ※ 專題演講 ※

# 關於獸頭鳳凰「吉利·富貴」 ——翱翔於亂世的吉鳥

松浦史子\*

## 前 言

二〇〇九年，筆者在臺灣中興大學所舉辦的「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以下看法：在漢代與鳳凰合稱為五鳳的五方神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經過劇烈變動的魏晉南北朝以後，為能合理解釋「儘管神鳥出現，王朝還是未能免於滅亡」此一歷史事實，五鳳逐漸含有凶鳥要素；筆者並對此變化過程進行探討<sup>1</sup>。其後，孫英剛教授在〈祥瑞抑或羽孽：漢唐間的「五色大鳥」與政治宣傳〉（《史林》，2012年第4期）一文中對筆者的論點提出意見，要點如下。

首先，筆者認為，與鳳凰類似的凶鳥名稱「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幾乎不見於唐代主要祥瑞記述中；由此推測隋唐以後有關此類凶鳥的記憶已被逐漸淡忘。對此孫英剛教授指出：唐以後這種似鳳凶鳥仍具有重要政治意義，例如唐代以後的一些史書把北魏、竇夏改元之際出現的鳳凰祥瑞看作是凶兆，因此不稱「五鳳」而稱「五大鳥」<sup>2</sup>。其次，唐代以後的史料確實為筆者所遺漏，正如孫英剛教授所指正

---

本文為2018年3月14日松浦史子教授為本所所做之專題演講。

\* 松浦史子，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准教授。

<sup>1</sup> 拙稿〈關於瑞祥志中可見的似鳳四凶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之來歷——以日本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引《樂斗圖》為端緒〉，原刊於《興大中文學報》第27期增刊（新世紀神話研究之反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日文版經過添加補正，收入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東京：汲古書院，2012年）。

<sup>2</sup> 如：唐代李延壽《北史》中，對於北魏末劉靈因「鳳凰祥瑞」而欲舉兵稱王之事，記云：「馴養大鳥，稱為己瑞，妄說圖讖，言劉氏當王。」見《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

般，曾與鳳凰一起被稱為五鳳的「發明·焦明·鸛鶴·幽昌」反被看作凶鳥的這種觀念並非止於六朝末期，而是在唐代以後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後漢以後，「吉利·富貴」常作為「天象」出現在墓葬文化中。本文試圖在孫英剛教授的研究基礎上，對「漢唐鳳凰的流傳與發展」的問題做一補充；並利用僅存於朝鮮半島和日本的祥瑞資料，透過兩者與四凶鳳（發明·焦明·鸛鶴·幽昌）之關係，結合漢唐時期的社會文化，對迄今幾乎還未被討論的「類似鳳凰的吉鳥——吉利·富貴」之產生和發展做一考察。

## 一、中國祥瑞資料中的「吉利·富貴」

### （一）唐代祥瑞總覽——屬於「大瑞」的瑞鳥

「祥瑞·瑞祥」源於戰國時代的天人感應，即「天」感應於為政者的德治而降下祥瑞。漢代以後，此概念與讖緯、陰陽五行等神祕思想結合，廣為流傳。漢初的祥瑞數量寥寥無幾，至漢末數量猛增，經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數量、種類愈增<sup>3</sup>。漢初祥瑞的種類僅十幾種，而在唐玄宗朝編纂的有關行政、法制的敕撰書《大唐六典·尚書禮部》（以下簡稱《唐六典》）中，共有一百四十種，分為「大瑞（六十一種）」、「上瑞（三十五種）」、「中瑞（三十一種）」、「下瑞（十三種）」四個品第<sup>4</sup>。其中不少原型不明，比如「大瑞」中的祥瑞。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它們誕生於漢

---

2928；五代劉昫《舊唐書》亦對隋末混亂時期，竇建德因「五大鳥」出現而改元五鳳，建國夏之事，記載為：「有五大鳥降于樂壽……因改年為五鳳。」見《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237-2238。

<sup>3</sup> 西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五行順逆」中有十一種祥瑞，東漢初期班固《白虎通》初次記載了以「景星」為首的二十七種祥瑞。東漢末數量激增（劉宋范曄《後漢書·章帝紀》：「在位十三年，群國所上符瑞，合于圖書數百千所。」見《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59），到六朝中期《宋書·符瑞志》，計有二百種之多。

<sup>4</sup> 把祥瑞分為大瑞、上瑞、中瑞、下瑞是從唐《禮部式》開始，此前六朝時代的祥瑞記述（《宋書·符瑞志》等）中，尚未區分品第。祥瑞等級化主要是在隋唐以後，為了使國家安定，需要在官僚機構內對祥瑞加以管理。參見大隈清陽：〈儀制令における禮と法——律令法系の構造的性質をめぐって〉，《律令官制と禮秩序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年）；水口幹記：〈類書『稽瑞』と祥瑞品目——唐禮部式と延喜治部省式祥瑞條に關連して〉，《古代日本と中國文化：受容と選擇》（東京：塙書房，2014年）等。

末至魏晉南北朝的亂世，在唐代被視為重要的祥瑞<sup>5</sup>。現今可見的《唐六典》中，最高品「大瑞」的鳥類祥瑞中有鳳、鸞、比翼鳥、同心鳥、永樂鳥，其後還有「吉利」、「富貴」，對後兩者還不見有人論述，本文試圖對它們的形成與流傳做一探討。

## （二）劉廣《稽瑞》所引孫柔之撰《瑞應圖》中的「吉利·富貴」

《唐六典》祥瑞項中只記載「吉利·富貴」名稱。在中國現存唐以前的文獻中，幾乎看不到相關記載，唯一相關的記載是六朝末梁代孫柔之所撰的《瑞應圖》（以下簡稱《孫氏瑞應圖》）。《瑞應圖》是用來判斷祥瑞真偽的圖解書，如書名所言，該書原以祥瑞圖為主，但後來「圖」散佚，只有「說明文」流傳下來。關於《孫氏瑞應圖》，現有以下四種版本<sup>6</sup>：

1. 明朝陶宗儀《說郛》本。
2. 清朝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3. 清朝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
4. 清朝葉德輝《觀古堂所著書》本。

在陶宗儀《說郛》、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收的《孫氏瑞應圖》中，找不到有關「吉利·富貴」的記載；而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以下簡稱《玉函續編》）以及葉德輝《觀古堂所著書》（以下簡稱《觀古堂》）所收的孫柔之撰《瑞應圖記》中，可見《稽瑞》所傳的相關佚文。

《稽瑞》是關於祥瑞的類書，其中有一百八十種祥瑞。由一對祥瑞的「本文」以及關於該祥瑞的「引文」組成，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孫氏瑞應圖》。據劉廣序得知，本書採用對句形式，對句又成對，各項目還配有源於「諸圖史」的引文。此種方法雖被認為與顏之推《稽聖賦》相似，但目前唯一對《稽瑞》進行過探討的水

<sup>5</sup> 《唐六典·尚書禮部》云：「凡祥瑞應見，皆辨其物名。若大瑞、上瑞、中瑞、下瑞，皆有等差，若大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僚詣闕奉賀。其他並年終員外郎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僚詣闕奉賀……。」（參見〔唐〕張九齡撰：《唐六典·尚書禮部》〔千葉：廣池學園事業部，1973年〕，頁89）可見，上瑞至下瑞是年終彙總上奏，只有「大瑞」要立即上奏。

<sup>6</sup> 六朝時期編纂的《瑞應圖》很多，比如：庾溫《瑞應圖》（《南齊書·祥瑞志》）、孫柔之《瑞應圖》（《隋書·經籍志》注中作《瑞應圖記》）、熊理《瑞應圖贊》（《新唐書·經籍志》），以及顧野王《符瑞圖》（《南史·列傳第五十九》）等。其中孫柔之的《瑞應圖》與唐《禮部式》所述祥瑞在很多項目上相同，因此被看作是唐代最受重視的《瑞應圖》（參見水口幹記：《古代日本と中國文化：受容と選擇》，頁44）。

口幹記氏認為，該書實際上是由很多引文組成的類書；關於成書時間，一般認為是唐代，水口氏提出可能是宋代<sup>7</sup>。如此，則《稽瑞》所傳《孫氏瑞應圖》的「吉利·富貴」是怎樣的祥瑞？

首先，在王仁俊《玉函續編》所收《孫氏瑞應圖》中，「吉利，鳥形獸頭也」的記述之後有王氏按語：「《稽瑞》曰：吉利鳥形，鰲封獸軀。」關於富貴的記述是「富貴者，鳥形獸頭也」，王氏按：「《稽瑞》曰：周匝曷至，富貴曷名。」這雖與《孫氏瑞應圖》的佚文「鳥形獸頭」一致，但在《玉函續編》中，富貴與吉利處於不同項，不成對<sup>8</sup>。與此相比，葉德輝《觀古堂》所收孫柔之撰《瑞應圖記》，同一頁中「吉利·富貴」成對記載，分別記述為「吉利鳥形獸頭也，稽瑞」、「富貴者鳥形獸頭也，稽瑞」，兩者都作「鳥形獸頭」（但無《稽瑞》本文之引用）<sup>9</sup>。在現行《稽瑞》中，吉利、富貴是分別置項，分別記述為「吉利鳥形，鰲封獸軀」和「周匝曷至，富貴曷名」，各自又都有來自《孫氏瑞應圖》的引文「吉利，鳥形獸頭也」「富貴者，鳥形獸頭也」<sup>10</sup>，由此推測，王仁俊將吉利、富貴分別置項，恐怕是承襲自《稽瑞》。總之，在《稽瑞》以及王仁俊輯《孫氏瑞應圖》中，吉利、富貴是作為不同祥瑞置項的。然根據現存日本的祥瑞資料，在《孫氏瑞應圖》中「吉利·富貴」同記述為「鳥形獸頭」，排列與葉德輝氏相同，可見兩者原來很可能是一對瑞鳥。

## 二、傳至日本的祥瑞志中的「吉利·富貴」

### （一）《延喜式·治部省》「祥瑞」項中的「吉利·富貴」

《延喜式》是現今保存最完整的日本三大格式（律令條文）之一，九〇五年時由藤原時平受醍醐天皇之命著手編纂；時平死後，由藤原忠平於九二七年完成，經

<sup>7</sup> 參見水口幹記《古代日本と中國文化：受容と選擇》第二章〈類書『稽瑞』と祥瑞品目〉、第三章〈類書『稽瑞』の成立年代について〉。

<sup>8</sup> 〔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子編五行類」所收《孫氏瑞應圖》「吉利」（頁262）、「富貴」（頁263）。

<sup>9</sup> 參見葉德輝《觀古堂所著書》（光緒辛丑夏六月刊本）第一集所收《孫氏瑞應圖記》「吉利·富貴」（頁22）。

<sup>10</sup> 參見〔唐〕劉廙撰：《稽瑞》，收入〔清〕鮑廷爵輯：《後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函》（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百部叢書集成》第71冊），第6葉裏—第7葉表「吉利」、第8葉表「富貴」。

改訂，於九六七年頒布施行。其中的〈治部省〉中有一個可謂是集當時祥瑞之大成的項目，有一四五種祥瑞，分成：「大瑞」五十九種、「上瑞」三十八種、「中瑞」三十三種、「下瑞」十五種。有研究表示，《延喜式·治部省》的「祥瑞」項依據的是《唐六典》卷四〈尚書禮部〉中有關祥瑞的記述<sup>11</sup>。

與《唐六典》一樣，「吉利·富貴」並列記載在「大瑞」項。值得注意的是《延喜式·治部省》祥瑞中有「雙行注」，這是《唐六典》所沒有的。筆者對「吉利·富貴」的雙行注有以下觀點<sup>12</sup>：首先，二者的記述皆作「鳥形、獸頭」，可見其祥瑞內容與上述《玉函續編》、《觀古堂》的《稽瑞》所引《孫氏瑞應圖》相同；同時「吉利·富貴」並列置項，可見成書時「吉利·富貴」應是成對的。其次，「吉利·富貴」是「鳥形、獸頭」，因此這一觀念的形成最遲應是在《延喜式》成書的十世紀初。為了進一步釐清「吉利·富貴」此「一對祥瑞」，下面欲考察僅存於日本的唐代《天地瑞祥志》。

## （二）《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中的「吉利·富貴」

《天地瑞祥志》是唐高宗麟德三年（666），由薩守真編纂的專門收集有關天地災異的祥瑞類書。書名最早見於《日本三大實錄》（876），江戶時代仍被使用。此外，平安初期的漢籍總目錄——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天文類」中也見該書名。由此可知，在日本，主要是陰陽家實際在判斷天變地異之吉凶的時候，會使用到此書。目前該書僅存於日本的佚存書，有三種抄本（前田尊經閣文庫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本、金澤市玉川圖書館加越能文庫本），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前田尊經閣文庫本。迄今為止，學界已對此書進行了內容與原典的比較和校勘工作<sup>13</sup>；近年來，研究深入到成書地點及具體內容，對該書的關心也不限於日本，而擴及韓國和中國<sup>14</sup>。

<sup>11</sup> 參見重松明久：《古代國家と宗教文化》（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第九章〈古代における祥瑞思想の展開と改元〉第三節「祥瑞の意味するものと改元」。律令中の祥瑞規定は模倣《大唐六典》，這一點可以由《法曹類林》卷二二六「公務三十四」的「蓋は倣《大唐六典》之體也」得到確認。

<sup>12</sup> 參見虎尾俊哉：《譯注日本史料 延喜式（中）》（東京：集英社，2007年）。

<sup>13</sup> 關於《天地瑞祥志》的研究史，參見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圖像篇」第二章。

<sup>14</sup> 如：權惠永：〈『天地祥瑞志』編纂者に對する新しい視覚——日本に傳來した新羅天文地理書の

現存《孫氏瑞應圖》（參見前述陶宗儀《說郛》、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葉德輝《觀古堂所著書》等四種版本）中僅有祥瑞的說明文。而前田尊經閣文庫藏《天地瑞祥志》的格式是上半部分為放置「圖像」的空間，下半部是該瑞祥的「說明文（開頭有所引書名）」，這種格式與敦煌出土的最完整的《瑞應圖卷》(P. 2683) 基本相同<sup>15</sup>。此外，在《天地瑞祥志》的部分，祥瑞實際附有圖像，再比如本文所選第十八「禽」項的鳳凰之後，依次是發明、焦明、鸞鵠、幽昌、鸞、吉利、富貴、鸞鷲、商羊（鴉）、鷓鴣等，從鳳凰到鷓鴣各項，都留有本應載「圖」的空白（圖一的上半部分及圖二）。在此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與前文所述《延喜式·治部省》的祥瑞記述內容不同，該書的卷頭目次中，「吉利·富貴」的名稱之後帶「鳥」字，被寫為「吉利鳥」、「富貴鳥」。第二，在《天地瑞祥志》中「吉利·富貴」被編錄在武則天政治改革中受到重視的鳳凰祥瑞「鸞鷲」<sup>16</sup>之前，由此可見其在該書之重要地位。而《天地瑞祥志》是如何表述這對唐代重要祥瑞「吉利·富貴」的？

名稱（反切）	圖像	出典及說明（筆者標點）
吉利（居實反入力至反去）	缺	《瑞應圖》曰：有鳥，獐頭足狀如鳳，名曰吉利鳥，見則吉利也。
富貴（扶陸反入居謂反去）	缺	《瑞應圖》曰：有鳥，牛頭足狀如鸞鵠，名曰富貴，見則為富貴也。（「吉利·富貴」參見圖二）

一例），《白山學報》第 52 號（1999 年）；趙益、金程宇：《〈天地瑞祥志〉若干重要問題的再探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3 期；余欣：《博望鳴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孫英剛：《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等。

<sup>15</sup> 敦煌出土的《瑞應圖卷》(P. 2683) 是現存《瑞應圖》中最早且最完整的圖文兼備實例，但首尾缺失，只殘存有「龜、龍、鳳」三種，末尾的「鳳凰」有一部分缺損。格式為：上半部分是「祥瑞圖」，下半部分是「說明文」。有學者根據文字內容認為，該書與顧野王《符瑞圖》有關（參見陳槃：〈古讖緯書錄解題附錄（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7 本〔1948 年〕，頁 65），還有學者指出其與《天地瑞祥志》在形式上類似（參見東野治之：〈豐旗雲と瑞雲〉，《遣唐使と正倉院》〔東京：岩波書店，1992 年〕）。

<sup>16</sup> 孫英剛認為，完成武周革命的武則天之所以重視「鸞鷲」，是因為它源於「周代出現於岐山的瑞鳥」（《國語·周語》：「鸞鷲，周之興也，鳴於岐山。」）參見孫英剛：〈前言〉，《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頁 236-237。另可參見圖二（第 6 葉裏）。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吉利·富貴」的出典被明確標示為《瑞應圖》<sup>17</sup>，同時，在王仁俊、葉德輝《孫氏瑞應圖》以及《延喜式·治部省》的雙行注中，只記述「吉利·富貴」的「鳥形獸頭」特徵，而《天地瑞祥志》還有對其「形狀」、「功效」的詳述。

《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說吉利「有鳥」，明指其為「鳥」，形狀是「獐頭足狀如鳳」，功效是帶來「吉利」。與此成對的富貴亦作「有鳥」，形狀是「牛頭足狀如鸛鷖」，能帶來「富貴」。所謂「鸛鷖」即前文談到的「似鳳凰的四隻大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中的一隻，與鳳凰一起被視為五方神鳥，其文字說明是「狀似鳳凰」（圖一）<sup>18</sup>，因此使人聯想作「鳳凰」。由此可知，「吉利·富貴」不單是「鳥」，且形狀與「鳳凰」類同。另外，王氏、葉氏所引《孫氏瑞應圖》以及《延喜式·治部省》的記述僅是「獸頭」，而《天地瑞祥志》的吉利作「獐頭足狀如鳳」、富貴作「牛頭足狀如鸛鷖」，具有動物的具體形象特徵。但這裏存有如何斷句問題，吉利可斷作「獐頭，足狀如鳳」，也可作「獐頭足，狀如鳳」；富貴可作「牛頭，足狀如鸛鷖」，也可作「牛頭足，狀如鸛鷖」。由此看來，唐代這對大瑞祥鳥究竟是何「形狀」？頭足皆獸形？還是只有頭是獸形？對此問題，筆者試從五世紀初高句麗古墓的一組祥瑞壁畫尋求答案。

### 三、高句麗古墓中的「吉利之象、富貴之象」

#### （一）德興里古墓壁畫——前室墓頂畫中的「牽牛織女」與「瑞鳥·瑞獸」

德興里壁畫古墓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發掘於北朝鮮大安市德興里（舊江西邑）的大型壁畫古墓，與中國吉林省集安的一批古墓群一道被視作是高句麗王朝時代的古墓之一，其中永樂十八年（408）的墓誌記有墓主「鎮」的生平。

該墓的重要性大體可概括為以下兩點：第一，根據前室北壁墓頂中央下部的墓誌銘以及壁畫的題材，對被葬者的出生地以及身分提出諸多意見，其中有「漢人」

<sup>17</sup> 《天地瑞祥志》中所引的《瑞應圖》屬於哪個版本（參見註6），並不清楚。

<sup>18</sup> 薩守真《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引「鸛鷖」：「《樂斗圖》曰，西方鳥也。狀似鳳皇。鳩喙，專形。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至則旱疫之滅，為早備也……。」（第6葉裏）

和「高句麗人」之說。比如，該墓發現之初，北朝鮮根據「遼東太守……幽州刺史鎮」此一記述，認為五世紀初高句麗的統治範圍至今中國河北一帶（幽州），把它當作是推翻以往高句麗王朝勢力版圖的重大發現，並寫進教科書<sup>19</sup>。然而該墓誌中還記述當時高句麗尚未有的郡縣鄉里制度，據此提出反駁意見者，目前認為是「從中國逃亡而來的漢人之墓」，在此點上達成共識<sup>20</sup>。第二，該墓的墓誌與壁畫記述和描繪，從先秦開始到佛教傳入高句麗的初期情況。但是，該墓的墓誌中不僅有稱讚先古帝王的儒家話語，而且以墓頂畫為中心，亦有許多的神仙道教題材，因此最近有觀點認為，此反映出儒、釋、道三教合雜的魏晉（南朝）知識分子的理想世界<sup>21</sup>。

該室由墓道、前室、通路、玄室組成，是二室橫穴石室構造。與墓道相連的前室是東西長方形，前室的墓頂為穹窿形（類似西方拱頂的圓形墓頂），向內緩慢傾斜向上，在頂部壘砌兩層長方形板石，形成平行支石形墓頂結構。接著是通道，其後是玄室，玄室比前室大。至於壁畫的內容，前室東壁和南面墓頂下部，畫的是現實世界的車馬出行圖、狩獵圖。於此相對照，南壁、墓頂上部和西壁，畫的是神祕的天上世界。很特殊的是前室南壁，從墓頂的東上方到西下方斜畫著藍色的天河，天河的西邊是織女，東邊是牽牛，緊接著牽牛的是狩獵圖。可見，西邊表示天上世界，東邊表示現實世界（圖三）。也就是說，東壁的現實世界與南壁從東側到中央的天河相接；隔著天河，從南壁的西側到西壁和北壁是壯觀而神祕的天上世界，畫滿長著翅膀的仙人、玉女、飛魚、飛馬、神獸、神鳥等。

在此要特別提到的是南壁西側天上世界的織女旁邊的獸頭鳥身圖。織女的右上方圖中寫有「吉利之象」（圖四），其下圖寫有「富貴之象」（圖四），目前出版的各種相關圖錄中，還未見從祥瑞方面對此兩鳥進行的比較<sup>22</sup>。例如載有該圖最新研究的小學館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1998）

<sup>19</sup> 參見朝鮮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進入幽州地域，設置州、郡、縣〉，《朝鮮全史（三）·中世編·高句麗史》（平壤：百科事典出版社，1979年），第4章；武田幸男：〈德興里壁畫古墳被葬者の出自と經歷〉，《朝鮮學報》第130輯（1989年）。

<sup>20</sup> 關於「墓主漢人說」，參見武田幸男〈德興里壁畫古墳被葬者の出自と經歷〉、田中俊明：〈德興里壁畫古墳の墨書銘について〉，《朝鮮史研究會會報》第59號（1989年7月）等。

<sup>21</sup> 參見門田誠一：《高句麗壁畫古墳と東アジア》（京都：思文閣出版，2011年），第2章第3節、終章。

<sup>22</sup> 收集信息最廣的海外圖錄《高句麗古墓壁畫》（平壤：朝鮮畫報社，1985年）中也只有「富貴神」，而無具體說明。

的解說中，也僅限於「其形態使人聯想到朱雀或青龍，充滿幻想難以形容」，「從旁有用墨寫的『吉利之象』『富貴之象』的文字，可以推測，是瑞獸」。但是，根據前文所述各祥瑞志中有關「吉利·富貴」的文字資料，筆者認為，把它們視為「瑞獸」恐不太妥當。

## (二)「吉利·富貴」是「獸頭」還是「獸的頭足」——文獻與圖像的對比

如前所述，《天地瑞祥志》「吉利·富貴」的說明文存在如何斷句的問題。是頭足皆為獸形？或是僅頭屬獸而足屬鳳凰？以下就實際圖像進行論述。

現存德興里壁畫古墓前室南壁的「吉利之象」、「富貴之象」圖，都是左右羽翅高揚，長尾分作三束，羽翅上端是淡綠色，翅根、軀體、三束長尾是朱紅色（圖四）。再看細部，吉利是獸面，頭上有兩個小角，角旁有耳；至於「足」，如果與該墓鳥之圖——陽光（圖五）比較，顯然不是「鳥」足，而是獸足。富貴的頭上也有兩個角（或是耳），臉是菱角獸面，足的形狀似三個並列的圓疙瘩，可見不應是鳥足<sup>23</sup>。

因此判斷，吉利是「獸頭」，身體是「鳥形」，《延喜式·治部省》與王、葉氏所引《孫氏瑞應圖》的內容正確；最新圖錄所謂的「瑞獸」為非。在此欲再分析一下「獸頭」，如前所述吉利有兩角又是獸足，筆者認為這與《天地瑞祥志》引《瑞應圖》所說的「吉利，獐頭足」吻合。從生物學角度來看，「獐」是棲息在中國，特別是北方到朝鮮半島的鹿，只有雄性才有兩隻小角（圖六）。把獐的角與鎮墓獸的「鹿角」（圖七）比較可知，前者的角極小，與後者種類迥異。再看德興里古墓壁畫吉利的足形，便知它不是「鳥」，而應是類似「鹿」的獸足。再來看富貴，與吉利相比，《天地瑞祥志》引《瑞應圖》的「牛頭」雖有不太清楚的地方，但其足形與吉利一樣，不是「鳥」而是「獸」。因此可以說，「吉利·富貴」的獸形部分不僅有「頭」還包括「足」。關於「吉利·富貴」的「鳥形」，《天地瑞祥志》

<sup>23</sup> 南秀雄〈高句麗古墳壁畫の圖像構成——天井壁畫を中心に〉（東京大學朝鮮文化研究室《朝鮮文化研究》第2號〔1995年〕）認為，德興里古墓中吉利的足是「獸」足，富貴是「鳥」足，這樣處理與「對稱性，對（陰陽）觀念」有關。筆者認為，德興里古墓富貴的足明顯有三個「圓疙瘩」，很難說是鳥足。另外，如本文圖八所示，北魏墓中所刻「獐頭·牛頭」的「吉利·富貴」，皆為獸足。因此，筆者認為「吉利·富貴」都是「獸」足。

引《瑞應圖》說富貴「狀如鸛鶴」，這一點值得注意。六朝至唐的祥瑞志和史書中記有「似鳳凰」的「鸛鶴」，而敦煌出土的《瑞應圖》（圖一，P. 2683）是目前可見對其色彩形狀有所描繪的唯一實例；「鸛鶴」兩翼高揚，有兩束長尾，翅尖淡綠，尾巴與身體是朱色<sup>24</sup>，這與德興里壁畫古墓中富貴的形狀色彩基本一致（圖一、四）<sup>25</sup>。綜合上述，筆者認為《天地瑞祥志》相應部分的斷句，吉利應作「獐頭足、狀如鳳」，富貴應作「牛頭足、狀如鸛鶴」。

通過與德興里高句麗墓中的圖像對比證明，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引《瑞應圖》所載的「吉利·富貴」在圖像上也基本正確。「吉利·富貴」的整體形象是鳥（鳳），頭足為獸，而且，吉利的頭足十分確定是「獐」；由此可見，無論是敦煌《瑞應圖》「鳳」項開頭處所畫的「鸛鶴」，還是《唐六典》和《延喜式·治部省》的雙行注，抑或《稽瑞》引《孫氏瑞應圖》，有關富貴的信息都不如《天地瑞祥志》引《瑞應圖》來得完整正確。在此之前，筆者曾論證《天地瑞祥志》所引「四隻凶鳳（發明·焦明·鸛鶴·幽昌）」在內容量和準確度上，都超越《後漢書·五行志》與敦煌《瑞應圖》（參見註1拙著「圖像編」第2章）。同樣，在「吉利·富貴」的記述上，《天地瑞祥志》的記載也是最全面、最正確的。另外，因篇幅關係未能詳細介紹的北魏石棺蓋中，也繪有二隻「獐的頭足」、「牛的頭足」的瑞鳳圖（圖八）<sup>26</sup>，可見德興里古墓以外，也有「吉利·富貴」圖存在之可能性。

#### 四、關於吉鳥鳳凰「吉利·富貴」的形成 ——歷史、思想背景

##### （一）「獸面鳳凰」與「人面鳳凰」——吉鳳類的誕生

《天地瑞祥志》引《瑞應圖》說「吉利·富貴」是「見則吉利也，見則為富貴也」，那麼這對瑞鳳「獸面吉利·富貴」是如何產生？在此試結合德興里古墓前室

<sup>24</sup> 敦煌《瑞應圖》中的四鳳（恐應是五鳳）形狀、色彩相同，很難區別，所以都被看作「似鳳」。

<sup>25</sup> 敦煌《瑞應圖》的四鳳是一束短尾緊接身體，短尾上展有兩束長尾；而德興里古墓的吉利、富貴則是三束長尾，但兩者在結構上相同。

<sup>26</sup> 黃明蘭編著：《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圖版編碼74「解放前洛陽東北鄉解坡村南尖塚內出土·飛仙石棺蓋畫像」。

西壁墓頂畫中帶榜題的「千秋之象」、「萬歲之象」的人面鳥（圖九）加以探討。之所以將「吉利·富貴」與千秋、萬歲聯繫，是因為兩者具有不少共同特點：該墓的千秋、萬歲和「吉利·富貴」一樣，也是張開兩翼，有三束長尾，翅尖是淡綠色，身體和尾巴呈朱色；另外這四隻鳥都屬鳳凰，都是「吉祥語」，具有「人面、獸面」的奇異形狀。

人面鳳凰的千秋、萬歲，除出現在德興里古墓之外，還有鄧縣學莊南朝墓畫像磚上帶榜題的「千秋」、「萬歲」人面鳥，主要存在於魏晉以後的畫像墓中。有關「人面鳳凰·千秋萬歲」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在何時？在《韓非子》、《戰國策》等先秦文獻中可以看到千秋萬歲之語<sup>27</sup>，而在漢以後魏晉的鏡銘文、鎮墓文和樂府中，亦可見許多祝願「現實長生不老，死後永遠安寧」的千秋萬歲吉祥語<sup>28</sup>。而關於「人面鳥·千秋萬歲」的記載，最早見於東晉葛洪的神仙理論專著《抱朴子》<sup>29</sup>。為釐清漢、魏晉時期流行的吉祥語「千秋萬歲」變成「人面鳳凰」的時代背景，下面試對二瑞鳳誕生期的思想觀念及其變化做一概觀。

### 1. 漢魏晉的神祕思想與「鳳凰」：

處於漢、唐兩大王朝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道教興隆，支撐漢王朝四百年的儒教被兩者取而代之；隨著北方異族入侵，短命王朝相繼更替。欲了解新的吉鳳為何在如此動蕩時期產生，首先要注意一個事實：追求不老不死進而昇仙的道

<sup>27</sup> 《韓非子·顯學》：「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戰國〕韓非：《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62-463。《戰國策·楚策》：「於是，楚王遊於雲夢……王抽旃旄而抑兇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漢〕劉向：《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490。

<sup>28</sup> 鏡銘文有〈漢千秋萬歲鐵鑑銘〉「千秋萬歲，富貴不斷」（見清翟灝《通俗編》卷十〈祝誦〉中「富貴不斷」條，轉引自宋代王黼《博古圖》）；鎮墓文有〈建初五年閏十月畫虜奴鎮墓文〉「生死異路，千秋萬歲，不得相注忤，便利生人」；樂府有〈晉杯盤舞歌詩〉「晉世寧，四海平，普天安樂永大寧。……人命長，當結友，千秋萬歲皆老壽」等。

<sup>29</sup> 《隋書·王劭傳》：「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及二麟雙鳳……各當其方位。……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卷69，頁1607-1608。《抱朴子內篇·對俗》：「千歲之鳥，萬歲之禽，皆人面鳥身，壽亦如其名。」〔晉〕葛洪：《抱朴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7。

教，與源於古代天人感應、災異祥瑞說，而興盛於漢代的讖緯（緯書）和陰陽五行等的神祕思想，是從一個共同思想的土壤中發展起來的<sup>30</sup>，具有這種神祕思想者是一群被稱為「方士」的術士；他們既是那時代的文人，也是災異祥瑞與神仙說的繼承者，又是漢代以後將讖緯神祕思想引入學術研究，在東漢到魏晉六朝道教形成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

在以漢、魏晉神祕思想為基礎的讖緯學說的流行下，彰顯善政，代表「天」意降臨的祥瑞中，「羽類之長」的「鳳凰」受到重視<sup>31</sup>。比如，漢代王充《論衡》中鳳凰與麒麟同被選為重要祥瑞，原因之一是漢代很多有關鳳凰祥瑞的上奏，其真偽不斷受到質疑<sup>32</sup>。同時，在陰陽五行說中，漢屬「火德」，所以「火禽」鳳凰在漢代是保障「漢王朝正統性」的重要祥瑞<sup>33</sup>；在魏晉動亂之後，仍然被尊崇為復興漢王朝的政治象徵<sup>34</sup>。另一方面，與讖緯、祥瑞共同興盛的神仙思想和道教中，鳳凰作為可「昇仙」的仙鳥，同樣受到重視。通過上述思想觀念可見，在漢、魏晉南北朝的神仙文學與墓葬畫中，「鳳凰」被描繪為仙人坐騎<sup>35</sup>，冠以「千秋、萬歲」名稱，成為祈念長生不老、永世安寧（千秋萬歲）的新祥瑞，在墓葬畫中有不少描繪。

<sup>30</sup> 參見安居香山：〈道教的形成と讖緯思想〉，《緯書と中國の神祕思想》（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

<sup>31</sup> 《白虎通·封禪》：「鳳凰者，禽之長也。上有明王、太平乃來，居廣都之野。」〔漢〕班固：《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288。東晉郭璞《鳳鳥贊》：「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收入〔唐〕歐陽詢：《藝文類聚·祥瑞部下·鳳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99，頁1709。

<sup>32</sup> 《論衡·講瑞》：「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可得知乎？」〔漢〕王充：《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737。

<sup>33</sup> 《春秋元命包》：「火禽為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故武王受鳳書之紀。」《鶡冠子》：「鳳鶡火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分別收入《藝文類聚》，卷99，頁1707；卷90，頁1558。

<sup>34</sup> 東晉干寶《搜神記》：「太安中……其秋，張昌賊起，先略江夏，誑耀百姓，以漢祚復興，有鳳凰之瑞，聖人當世，從軍者皆絳抹額，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蕩，從亂如歸。」見《新輯搜神記·張騁牛言》（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32-233。

<sup>35</sup> 葛洪《抱朴子內篇·對俗》：「夫得道者，上能竦身於雲霄，下能潛形於川海，是以蕭史偕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見《抱朴子》，卷3，頁49。《後漢書·逸民列傳》：「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見《後漢書》，卷83，頁2771-2772。在這裏象徵駕馭鳳凰的神仙蕭史與王子喬，在魏晉後的墓葬畫像中也成為重要的繪畫題材。

## 2. 人面鳳凰「千秋萬歲」的誕生——與《山海經》的關係：

千秋萬歲的「人面」有哪些要素？《山海經》是先秦時期具有神話性質的博物志，在此試藉由該書在漢、魏南北朝的影響對千秋萬歲的人面做一探討。據傳《山海經》經漢劉向、劉歆父子校訂曾一度流行，其後影響力逐漸消失（郭璞〈山海經序〉），但漢末以後，《山海經》奇異的神話世界在以神仙思想為核心的道教流行背景下，經「方士」之手再度復甦<sup>36</sup>。

如前所述，從漢至唐祥瑞的種類和數量迅速增加，其原因目前被認為是由於「方士」<sup>37</sup>，也就是說，在讖緯、神仙、道教等神祕思想背景下創造出「千秋萬歲」如此奇異祥瑞之人，是與傳播《山海經》奇異神話者有共同思想的土壤。前人已指出，《山海經》原附「圖像」<sup>38</sup>；最早對這種附有奇異圖像的古書——《山海經》加以系統註釋，並且主張奇異神話博物世界真實性的，是晉代博物學者郭璞。郭璞精通讖緯、陰陽五行、神仙、道教等神祕思想；在緯書學說影響下，他把具有古代吉凶觀的《山海經》的「異形博物」與「異形祥瑞」結合起來。筆者曾對最早出現於《山海經》的一角武獸「兕」在東漢墓葬畫中多被描繪為有翼瑞獸此一現象進行過考察<sup>39</sup>，現在試從漢唐動亂期所見「異形祥瑞」與《山海經》的關聯出發，對祥瑞

<sup>36</sup> 參見伊藤清司：〈はじめに〉，《中國の神話傳說》（東京：東方書店，1996年）。

<sup>37</sup> 一般認為，緯書的作者是「學者、方士、思想家」，參見安井居山：〈緯書思想研究上の諸問題〉，《緯書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漢魏文化研究會，1996年），頁68。

<sup>38</sup> 宋朝朱熹（參見王應麟《王會篇補注》所引）、明朝楊升庵（《楊升庵全集》卷二〈山海經後序〉），以及清朝畢沅、阮元都曾提及《山海經》的古圖；今人有松田稔〈『山海經』海經における繪畫の要素〉（《學苑》，1989年1月號）等。

<sup>39</sup> 參見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圖像篇」第一章。正確判斷「形狀奇異的祥瑞」真偽的依據是圖解書（圖書）。最早有武氏祠的東漢畫像石中的祥瑞圖，其中所刻的祥瑞名稱與說明文字，被看作就是緯書的圖解（佐原康夫：〈漢代祠堂畫像考〉，《東方學報》〔京都〕第62冊〔1991年〕）。在此基礎上筆者（松浦）注意到，武氏祠東漢祥瑞圖中《山海經》的鳥獸圖與經文描繪在一起。這是證明古代含有吉凶意義的《山海經》異獸，在漢代讖緯（緯書）學說興盛的影響下，與「形狀奇異的祥瑞」相融合的好例子；最早見於《山海經》的一角武獸「兕」，在東漢畫像墓中多被描繪為有翼祥瑞也是一例。另外，《山海經》中的博物「轉化為祥瑞的現象」，在晉代郭璞《山海經圖贊》中也可看到（兕、九尾狐、白虎、白狼、水馬、騶吾等）。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為原因之一是《山海經》既有原始預言書的性質，又有「異形博物圖志」的性質，在這一點上與同樣擁有「異形祥瑞圖解書」的預言書——緯書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參見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圖像篇」第二章）。

「人面鳳凰・千秋萬歲」的產生做一探討。

附有異形圖的《山海經》原有很多「人面鳥」(圖十)<sup>40</sup>，其數量多於人面「獸」和人面「魚」，而魏晉以後被後人改編的《山海經》系列志怪書、博物志、地理志中，則沒有如此多的「人面鳥」。比如，《神異經》中「人面獸」的數量極多，而「人面鳥」幾乎沒有。松田稔氏分析《山海經》中多見人面鳥這一問題，認為在人格神的問題上存在一種觀念，即動物形的山岳神也應具有人的要素，於是山岳神被賦予「人面」，這種人面特徵保留殷代的古老思想觀念<sup>41</sup>。人面鳥、千秋萬歲最早出現在東晉的《抱朴子》中，該書是匯集傳統神仙思想的神仙理論著作。後漢以後，以方士為中心的緯書、神仙、道教等神祕思想興起，在此基礎上，《山海經》的古老神話世界重新復活。因此我們試做如此推測，即在上述思潮中，在《山海經》傳統人面鳥的神話意象與「異形圖像(人面鳥)」(圖十)的共同影響下，誕生了「人面瑞鳳・千秋萬歲」(圖九)。「吉利・富貴」雖是「獸頭」，但其圖文也應和「千秋・萬歲」一樣，源於傳承古代「人面鳥，獸頭神」等「異形博物」的《山海經》。

## (二) 獸頭獸足的鳳凰「吉利・富貴」的誕生——「吉鳳」與「凶鳳」

### 1. 繼承《山海經》筆法的「獸頭獸足吉鳳」：

緯書和《山海經》雖然都是刊載很多「異形博物」的圖解書，但兩者在「災異祥瑞(吉凶)」的筆法上存在差異。松田稔氏曾經從筆法角度對未受到緯書學說

<sup>4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四川：巴蜀書社，1993年增補修訂本)。「南山經」：「〈南次三經〉之首，……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鳴自號也。」(頁17-18)「又東四百里，曰令丘之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顛，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頁21-22)「西山經」：「〈西次二經〉之首……。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覺溪，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頁39-41)「〈西次四經〉之首……。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鴉而人面，雝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頁69-77)「北山經」：「〈北山經〉之首……。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頁80-89)

<sup>41</sup> 松田稔：〈異形山岳神小考——『山海經』を中心として〉，《漢文學會會報》第22輯(1976年)、〈古代中國における神格の形狀——『山海經』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文學論究》第42冊(1983年)等。

影響、保留古代原始吉凶觀的《山海經》，與反映漢代以後神祕思想的預言書、緯書的災異祥瑞進行比較研究；因此筆者先依據其研究成果，通過對「鳥」的吉凶預言，確認雙方特徵，之後再與「吉利·富貴」吉凶的記述進行比較<sup>42</sup>。

A. 《山海經》：

(a) 〈南山經〉：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安寧。

(b) 〈西山經〉：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僊，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B. 緯書：

(a) 《禮緯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于苑林。

(b) 《春秋緯感精符》：王者上感皇天，見鸞鳳至。

《山海經》使用以下這種原始的預言方式：從「有鳥」開始，介紹其「形狀、名字」等，這種鳥（鳳凰、鳧僊等導致災異祥瑞的動植物）的出現會導致「安寧、戰亂」；在此因果關係下，未知的自然現象（形狀奇異的動植物）出現，具有給「人事（人間社會）」帶來安寧或戰亂的功效。與此相比，緯書所使用的筆法為：先寫「為政者的善政、惡政（安寧、戰亂等）」，把這種「人事」作為災異祥瑞（吉凶）出現的原因；如此的因果關係與《山海經》正好相反。

而《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中的「吉利·富貴」凶吉之筆法為何？

C. 《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

(a)「吉利」：有鳥，獐頭足，狀如鳳，名曰吉利鳥，見則吉利也。

(b)「富貴」：有鳥，牛頭足，狀如鸕鷀，名曰富貴，見則為富貴也。

（有鳥，狀如……，名曰〔形狀、名字（自然現象在先）〕，見則〔吉利·富貴等的吉兆（人事效果是結果）〕）

參考上述《山海經》和緯書的例子，可以說《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中有關「吉利·富貴」的記述不是繼承緯書，而是繼承自《山海經》的原始吉凶預言筆法；這種筆法又與《山海經》中〈南山經〉鳳凰的祥瑞例基本相同，由此推測吉利、富貴二鳥屬於《山海經》鳳凰譜系<sup>43</sup>。

<sup>42</sup> 參見松田稔：〈『山海經』における災異〉，《日本文學論究》第30冊（1971年）、〈『山海經』に於ける瑞祥〉，《漢文學會會報》第27輯（1981年）。另外，關於《山海經》的鳥，筆者在本節中舉了吉鳥和凶鳥兩例，在《山海經》中多是凶鳥，吉鳥只有鳳凰、鸞鳥等極少例。

<sup>43</sup> 緯書式《山海經》的影響在郭璞的著作中非常明顯（參見註39）。另一方面，如《天地瑞祥志》

如前所述，根據德興里古墓的墓誌可以確定其年代是「永樂十八年(408)」，該墓壁畫的內容反映魏晉文人的理想世界（參見註21）。這種描繪魏晉文人理想世界的「異形瑞鳳圖」——標有榜題「吉利·富貴」、「千秋·萬歲」的祥瑞圖，也是證明魏晉祥瑞來源於《山海經》的珍貴範例<sup>44</sup>。

## 2. 吉鳳凰「吉利·富貴」產生的背景——與「凶鳳」的關聯：

以《山海經》為代表，鳳凰自古以來被認為是「給天下帶來安寧的吉鳥」（見上述A(a)）。儘管如此，為何還要加上「吉利·富貴」如此「吉祥語」的「名稱」呢？對此，筆者注意到以下過程：與「鳳凰」一起被視作「五鳳」的五方神鳥「發明·焦明·鸛鷖·幽昌」<sup>45</sup>，經過動亂的魏晉南北朝變成「凶鳳」，而在六朝至唐的祥瑞志（《天地瑞祥志》、敦煌本《瑞應圖》等）中，「鳳凰」又被置於鳳項之首的重要位置，筆者欲藉由此一過程對「吉利·富貴」名稱的由來做一探討（參見圖一上半部和說明文的末尾<sup>46</sup>）。在以前的論證中，筆者曾指出與鳳凰一起的五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被加上「凶兆」的原因，即在於根據五鳳的出現而改元的三國吳的「五鳳」時代，最終仍因失政而告終，「五鳳」時代成了吳王朝滅亡的時代<sup>47</sup>。另外，吉祥語的寶庫青銅鏡銘文中「吉利·富貴」被大量刻寫，其時代也是在三國吳的五鳳時代前後。

---

引《瑞應圖》的「吉利·富貴」那樣承襲了原始《山海經》筆法的新祥瑞，或是對完整保存了古代吉凶觀的《山海經》異形博物加以完整引用的例子，在六朝至唐的圖解書中也不少。這種現象在魏晉時期的博物、異物志中很多，是當時對《山海經》傳承的特徵之一，值得注意。

<sup>44</sup> 德興里古墓壁畫中，在「吉利·富貴」旁邊還畫有最早見於《山海經》的「飛魚」，人面獸「猩猩」等（圖三），此圖別無他見。這也說明魏晉祥瑞世界與《山海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sup>45</sup> [漢]許慎著，[清]鈕樹玉撰：《斷句套印本說文解字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0年）「鸛」：「鸛鷖也。从鳥肅聲。五方皆神鳥也。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鸛鷖，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sup>46</sup> 薩守真《天地瑞祥志》引《樂斗圖》的「發明·焦明·鸛鷖·幽昌」的說明文末尾記載，如果這些出現，就會發生「戰爭（發明）」、「水害（焦明）」、「旱（鸛鷖）」、「旱（幽昌）」的凶事。同樣的凶事在《後漢書·五行志》注、敦煌本《瑞應圖》引「發明·焦明·鸛鷖」的記載中也可看到。

<sup>47</sup> 參見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圖像篇」第二章。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是記述這四凶鳥的最早史料，「五行志」的編纂期剛好是「因出現鳳凰而改元五鳳，可王朝卻遭滅亡」的三國吳的五鳳時期，相當於司馬彪的青年期。

有「吉利·富貴」之語的青銅鏡銘文如下（括號內的年號為筆者所加，「？」為原文所有）<sup>48</sup>：

- 赤鳥七年（244，吳孫權）半圓方形帶神獸鏡  
□鳥七年在（？）□□丙牛昭（？）□日青清明□。百□漳。服者富貴。  
長樂未央。子孫□□□□□陽□□□。
- 五鳳元年（254，吳孫亮）半圓帶神獸鏡  
五鳳元年□□□□牛庚申□□□□□□□大吉利永年。
- 五鳳三年（256，吳孫亮）神獸鏡  
五鳳三年三月□造清竟。服者富貴宜侯王。
- 寶鼎二年（267，吳孫皓）正月半圓方形帶神獸鏡  
寶鼎二年正月十五日。造作明鏡。百凍精銅。服者富貴。宜公卿。五馬千□□□。
- 西晉太康四年（284，晉司馬炎）半圓方形帶神獸鏡  
太康四年正月廿八日。造作青竟。幽凍三商。青龍白虎。東王之公。西王之母（？）。富貴世世吉利大平。
- 鳳凰元年（386，相當於東晉）九月半圓方形帶神獸鏡  
鳳凰元年九月十二（？）日。吾作明鏡幽三商。大吉利。宜子孫壽萬年。家有五馬千頭羊。

可見吉祥語「吉利·富貴」被大量刻寫的古鏡製作年代，正是因鳳凰出現而多次改元的三國至魏晉時代。這個時代是保障不斷更替的短命王朝合法性的祥瑞——特別是反映這一時期神祕思想的鳳凰——被大量上奏的時代；同時也是：為合理解釋為何有鳳凰祥瑞的上奏，王朝還是滅亡，於是凶鳳（發明·焦明·鸛鷄·幽昌）應運而生的時代。換言之，這是一個受「鳳凰災異」威脅的時代<sup>49</sup>。從上述時代背景可推測出以下意圖：通過用「吉祥語」來命名，使吉鳳「吉利·富貴」從誕生起就具備「吉兆」的功效。

<sup>48</sup> 參見梅原末治：《漢三國六朝紀年鏡圖說》（京都：桑名文星堂，1931年）、駒井和愛：〈銘文に見える吉祥の語句〉，《中國古鏡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第4章等。

<sup>49</sup> 參見拙著《漢魏六朝における『山海經』の受容とその展開——神話の時空と文學・圖像》「圖像篇」第二章。

《山海經》中「人面鳥」的名稱多源於「鳥聲」（《山海經》之〈西山經〉：「名曰鳧溪，其名自叫也。」另參見註 40），而「吉利·富貴」卻源於「吉兆的功效」（《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之「吉利」：「名曰吉利鳥，見則吉利也。」「富貴」：「名曰富貴，見則為富貴也。」）從敘述方式上看，《瑞應圖》的「吉利·富貴」似源於《山海經》鳳凰，可是《山海經》的鳳凰名稱與「吉兆功效（安寧、太平）」無關。於是這樣一對吉鳳「吉利·富貴」誕生了；它們不像《山海經》的人面鳥附有表示「動態」的名稱，它們雖屬《山海經》的瑞鳳譜系，記述方式卻與傳統鳳凰不同，而是以表示「吉兆功效（吉利·富貴）」的名稱來命名並強調。唐代重要的祥瑞「吉利·富貴」之所以得以傳播，應與魏晉至隋唐期間存在與其相對立的「將天下導向滅亡的凶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有很大關係。

筆者認為，吉鳳「吉利·富貴」很可能是在四凶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的基礎上產生的，相關旁證有以下諸點：

(1) 鳳凰原本是吉兆的象徵，卻附加「吉祥語」的「名稱」。

(2) 從三國時代開始，「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帶有「凶事」要素，而有關「吉利·富貴」的圖像和文獻記載無早於三國的。

(3) 從《天地祥瑞志》所引《瑞應圖》中「富貴」的經文以及德興里古墓中的富貴圖像來看，富貴應與三國以後的四凶鳳之一「鸛鷖」有關。

(4) 在《天地祥瑞志》中「吉利·富貴」的排列順序在四凶鳳之後。

綜合以上諸點，筆者做出以下結論：獸頭獸足的鳳凰「吉利·富貴」，是產生於魏晉南北朝動亂時期流傳的「招致災異的四凶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所引起的恐懼，同時也是還原吉鳥本來面貌而誕生的「亂世吉鳳」<sup>50</sup>。

## 結 語

對魏晉南北朝畫像墓有深厚研究的鄭岩氏注意到，甘肅一帶的魏晉十六國墓畫圖與高句麗德興里古墓中的祥瑞圖類似，推測兩者所參照的「瑞應圖」應相同<sup>51</sup>。

<sup>50</sup> 兩者也存在差異。根據「吉利·富貴」圖像只出現於墓葬文化這一事實推測，凶鳳「發明·焦明·鸛鷖·幽昌」可能是與現實政治、歷史密切相關的祥瑞，而吉鳳「吉利·富貴」則是與死後世界密切相關，具有強烈民間宗教、文化色彩的祥瑞。

<sup>51</sup> 參見鄭岩：〈從魏晉壁畫墓看涼州與中原的文化關係〉，《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北京：文物

對此試做進一步補充。如果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中「與鳳凰相似的凶鳥（發明·焦明·鸞鷖·幽昌）」確實是敦煌本《瑞應圖》(P. 2683)以「鳳」開頭名稱不明的四隻鳳凰（圖一），則我們對僅見於北朝鮮德興里古墓中附有「榜題」圖像，以及在《天地瑞祥志》中有最詳細文字記述的「吉利·富貴」可做如下推測：敦煌本《瑞應圖》四凶鳳的缺損部分（圖一下半部、左端），原來很可能有《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吉利·富貴」的說明文（圖二），並且附有與德興里古墓相同的「獸頭獸足鳳」（圖四、十一）<sup>52</sup>。再者，敦煌本《瑞應圖》的凶鳳圖，原來也應畫在《天地瑞祥志》四凶鳳的空白處（圖一箭頭標記處）。據此進一步推測，原本應畫於《天地瑞祥志》「吉利·富貴」空白處的吉鳳圖（圖二），可能與德興里古墓的「獸頭獸足鳳」相同（圖十二）。從六朝至隋唐，很多緯書因為被認為會招致內亂而被焚毀，因此中國現存的祥瑞資料十分有限。在此情況下，對保存在中國週邊區域的祥瑞圖像及文獻進行綜合研究，可能會使很多祥瑞同六朝至唐受重視的凶鳳「發明·焦明·鸞鷖·幽昌」和吉鳳「吉利·富貴」一樣，得以還原其本來面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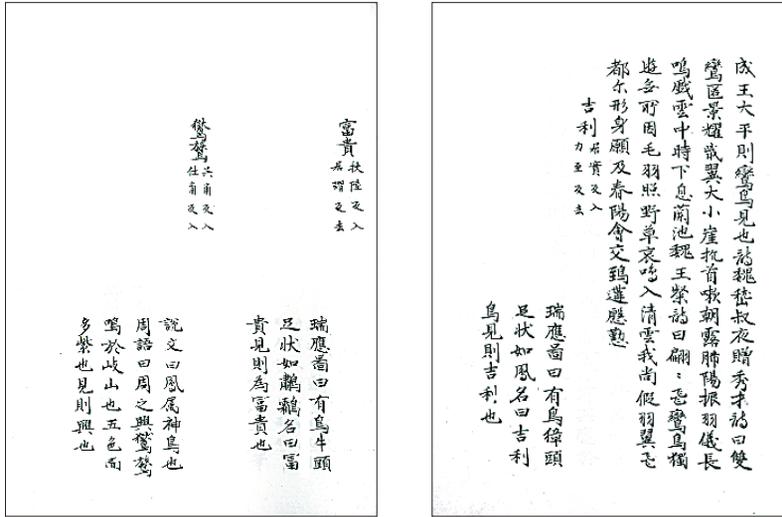
出版社，2002年），頁175-176。另外，鄭岩氏的見解源於巫鴻氏和段文傑氏。巫鴻氏認為山東東漢武氏祠畫像石祥瑞圖來源於原本的《瑞圖》(Hung Wu,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段文傑氏認為與漢晉祥瑞圖不可分的敦煌出土的《瑞應圖》對甘肅河西一帶的墓葬壁畫產生了影響（段文傑：〈道教題材是如何進入佛教石窟的〉，《段文傑敦煌石窟藝術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

<sup>52</sup> 敦煌本《瑞應圖》與《天地瑞祥志》的特點是「圖像、說明文」兼備，在現存祥瑞志中信息量最多，同時兩者之間有諸多共通處（參見註14）。另外在《天地瑞祥志》的第十八「禽」項中，從開頭的鳳凰到鸞鷖（其中包括本文探討的「吉利·富貴」），全都是鳳類（圖一），這種匯集同類祥瑞的形式也與敦煌本《瑞應圖》相同。根據這些類似點推測，與《天地瑞祥志》「禽」項開頭的鳳組相同，敦煌《瑞應圖》鳳凰的缺損部分，在「發明·焦明·鸞鷖·幽昌」之後，原本也應該有獸頭足的祥鳳「吉利·富貴」圖。

## 謝 辭

- 本文是依據發表於二〇一八年三月十四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舉辦的「劉宋：多視角的斷代研究」重點主題計畫之專題演講的論文修改而成。在研討會上，主持人李豐楙教授以及與會學者提供諸多寶貴意見，在此特申謝忱。
- 在圖像製作過程中，深受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博物館主任研究員（准教授）下野玲子女士的協助。
- 在翻譯過程中，則有日本明治大學大山潔兼任教師、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林桂如助理教授的協助，在此向諸位表以謝忱。





圖二：《天地瑞祥志》所引《瑞應圖》「吉利·富貴」（前田尊經閣文庫所藏）。



圖三：德興里古墳前室南壁墓頂畫「牽牛之象、織女之象（中央下部是猩猩之象）」（《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東京：小學館，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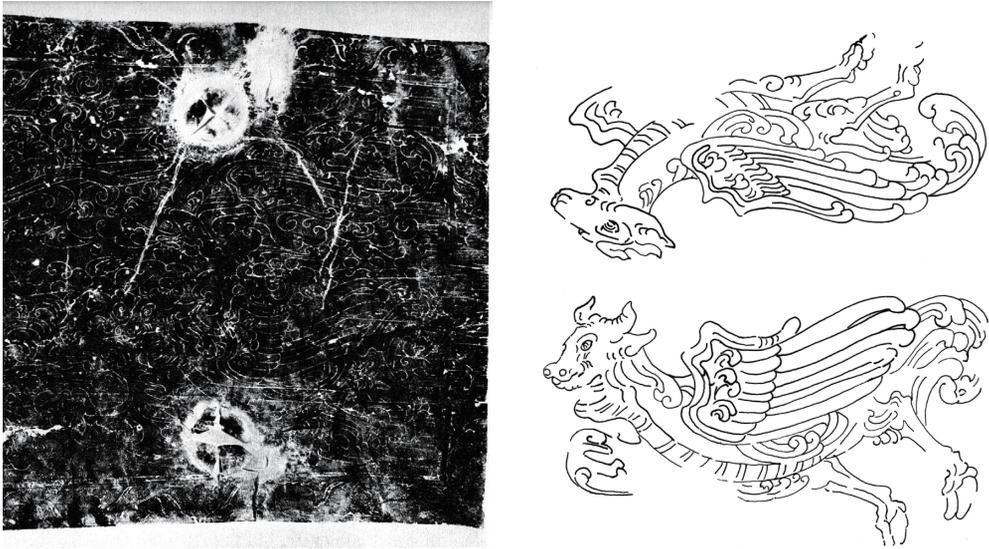
圖四：德興里古墳前室南壁墓頂畫「吉利之象（左上）、富貴之象（右下）」（《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



圖五（左）：德興里古墳前室東壁墓頂畫「陽燧之象」（《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10——高句麗·百濟·新羅·高麗》）。

圖六（中）：「獐鹿」（網址：<http://www.naturfoto.cz>）。

圖七（右）：中國湖北省博物館藏——鎮墓獸（東京國立博物館編：《特別展：中國王朝の至寶》〔東京：每日新聞社，201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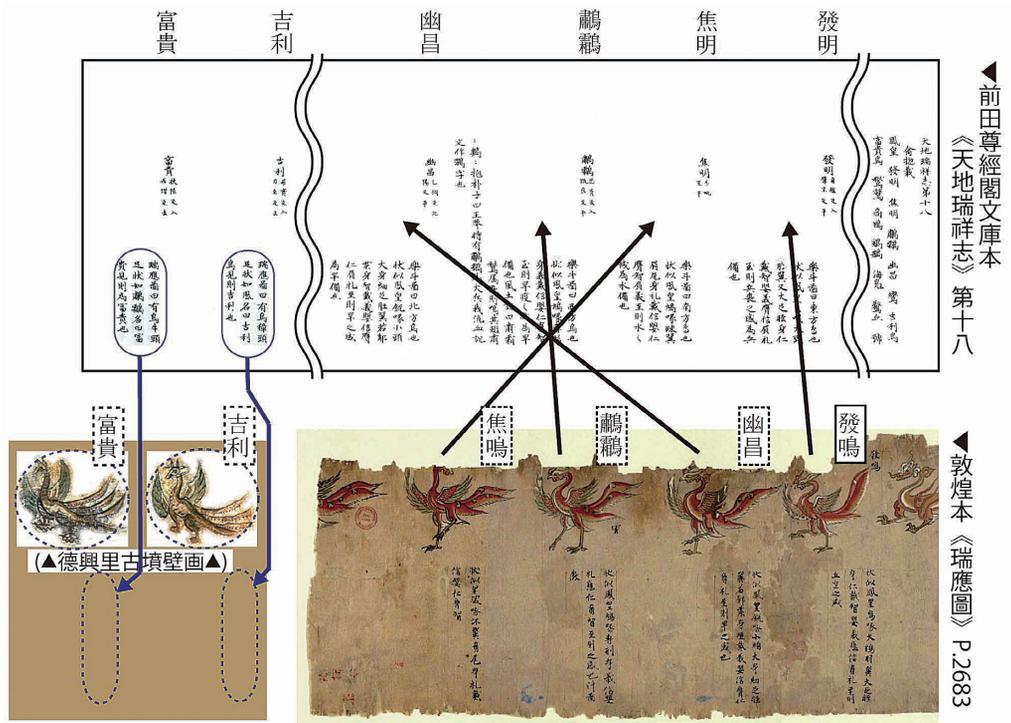
圖八：左為照片，右為根據照片所畫的復原圖（下野玲子研究員協助復原）：1945年前洛陽東北鄉解坡村南尖塚內出土之飛仙石棺蓋畫像中牛的頭足（下）、獐的頭足的瑞鳥圖（上）（黃明蘭編：《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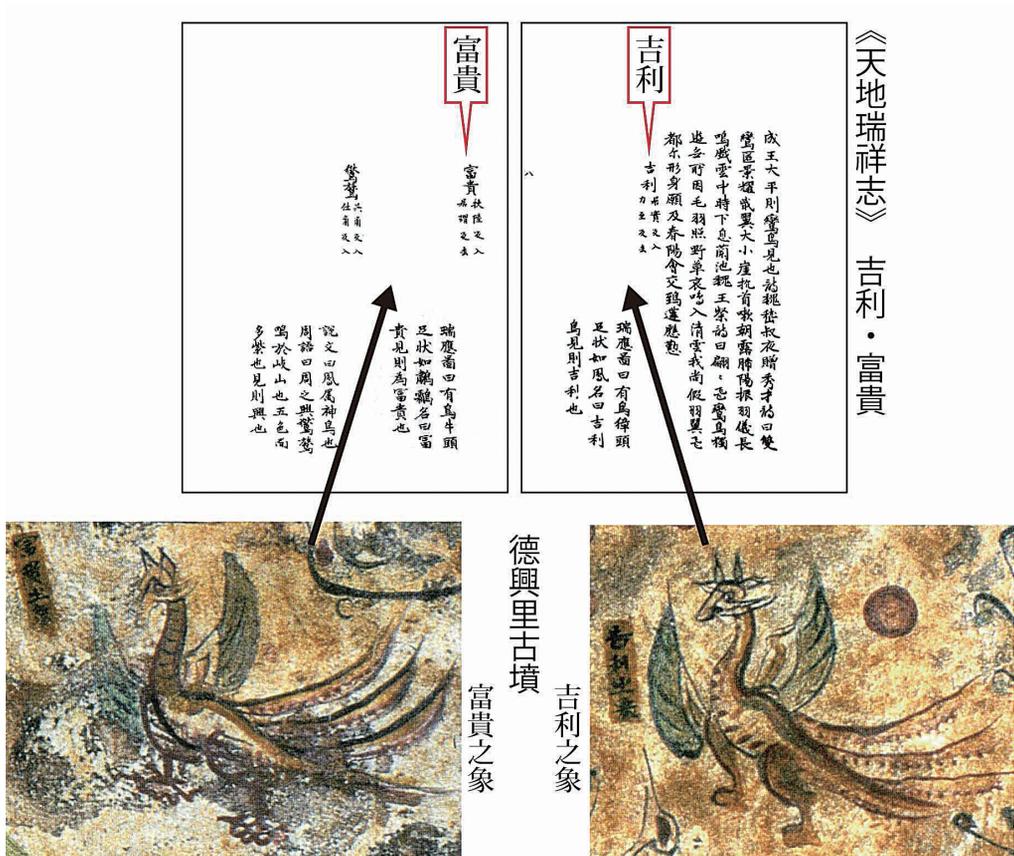
圖九：德興里古墳前室西壁墓頂畫「千秋之象（右上）、萬歲之象（右下）」（《高句麗古墳壁畫》〔平壤：朝鮮畫報社，1985年〕）。



圖十：《山海經》的人面鳥（馬昌儀著：《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引用明朝胡文煥圖本）。



圖十一：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開頭（鳳凰部分）與敦煌本《瑞應圖》(P. 2683) 鳳凰開頭部分的比較。



圖十二：德興里古墳的「吉利·富貴」圖與前田尊經閣文庫本《天地瑞祥志》第十八「禽」「吉利·富貴」的對照。

